

從香港本土文化看香港人意識之形成

1994 年發表於台灣港澳協會主辦之「香港問題研究會」

陳美燕 楊聰榮

一、緒論

隨著九七問題的白熱化，香港問題成為世所矚目的焦點。因為當前香港居於亞太金融資訊中心的地位，各國對於香港的未來頗為關心，中英之間對於香港問題的爭拗，就成為國際新聞的一個焦點。也因為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歷史上的特殊性，也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近年來也出現了許多以香港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報告。然而多數的研究是集中在政治及經濟事務，缺乏對於文化面向的討論，而且多從外在的角度去觀察，也因此我們對香港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觀光購物，和成龍、周潤發、梅豔芳等港星以及港片裡動感十足的粗淺印象，而無法進一步認識所謂的「香港文化」，以及香港文化對其政經、社會各層面的影響。

當筆者開始著手收集香港的各方面材料時，即深深感到我們對於香港的文化事務關注太少，因而對於香港最近這些年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特色欠缺應有的體認。而在娛樂文化（以電影、電視和流行曲為主）的範疇裡，「港式風格」的文化在這近十年來上有極大的變化與長足的發展，並且可以說其發展已經到了影響香港人的意識的程度，甚至成為可以出口的文化商品，對台灣、日本、東南亞各地及北美華人地區產生一定的影響。根據香港學者蔡寶瓊的研究（蔡寶瓊，1990），指出「香港人」和「香港文化」是近十年出現的新現象，它們的出現，標誌著香港已不只是一個地理區域，而是一個獨立的文化體系。他認為這代表（一）香港居民有一種本土歸屬感，也即是有「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二）在香港可以見到有別於其他社會的生活模式和價值取向的組合；（三）香港有自己的文化產品，最主要的是大眾文化產品，包括電視劇集、電影和流行歌曲，而這些產品的獨特風格，很大程度是源於香港獨特的社會模式和價值取向組合的。

香港擺脫中國主流文化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其中是經過一番轉折的。以往香港沒有自己的「身份」，卻有一個沉重的包袱 - 中國。當時從中國內地到香港借居的中國人，對自己鄉土親族有強烈認同，從各種同鄉會或宗親會的成立便可知曉。老一輩的文人知識份子總慣背負沉重道德使命包袱，以振興傳統中華文化為己任，以身為中國人為榮。加上港府殖民地統治亦強化市民對香港社會政治事務的冷漠與疏離，無心參與社會政治事務，很自然地無法建立對香港的認同與歸屬感。現在情勢則大為轉變，港人雖不少人爭取移民海外，但同時在不少方面

卻可看出加深認同香港文化。例現報章雜誌和電視媒體拓展報導香港本地政治社會新聞；書局一系列的「香港研究」書籍；還有學界的發展「香港學」（1），看出香港本身已經逐漸成為知識份子的關心焦點。蔡寶瓊指出，從香港社會發展歷史中，可瞭解香港與中國在社會文化層面割裂後，新生代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身份認同危機，而這個危機最後因為本土文化和「香港人」公民意識的產生而獲得解決。

在筆者一研究「國家文化意識與學校日常生活規律的權力結構」中（陳美燕，1993），曾指出在當代台灣，為維護「傳統中國文化」正統地位，國家努力建構國民意識、理念理性和道德行為，以促進國家認同和形塑國民的文化意識的同時，「學校教育」在傳播意識型態或轉化意念（ideas）和精神（ethos）為實踐（practice）扮演主要的角色。而香港社會則不同，香港人的文化意識的形成可能與學校教育無直接相關，而是和那七十年代冒升的本土文化有關。

因此本文試圖探討香港本土文化與「香港人」意識產生之關係。但文化事務複雜萬端，並非一個小型研究所能涵蓋。筆者一直在思索如何能將香港此一文化上的發展變化討論出來，因此選擇一個特定的重要主題，並且由此一特定主題去考察香港大眾文化發展的幾個不同面向，以討論其間的關係。筆者擬從「文化認同」切入討論，因為對於目前香港來說，這是個涉及廣泛而且重要的問題，可以幫助吾人比較廣泛地討論文化整體的發展，同時對於我們理解香港來說，也是重要的核心問題。

因而本研究將研究重點放在香港人的文化認同之上，並且以文化認同為核心去關照香港的大眾文化的發展。由於文化認同是個集體的社會心理的呈現，有其主觀性的一面也有其客觀性的一面，主觀性的一面是指文化認同是主觀的感覺，而且可能變化很快，不易掌握，另一方面又有其客觀性的一面，因為是一種集體的心理的表徵，在一段時間的歷史發展之後，會呈現出一定的樣態和風貌，表現在不同的公共領域，而可以清楚的捕捉。由於是有主觀性的成分，必須考慮當地社會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特色及社會脈絡，所以本研究是以香港當地學者的研究材料為題材，同時也因為其客觀性，所以希望討論最具有廣泛基礎的文本，大眾文化媒體及雜誌遂成為最好的研究對象，因為其閱讀的的群眾廣泛而不特定，大眾媒體一方面必須迎合大眾口味，一方面又塑造了大眾口味，是最具有代表的研究對象。

所以本研究乃先進行大量蒐集有關的資料與文獻，並輔以參與觀察和訪談，以試著探討新生「香港大眾文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基礎，其運作過程與發展和形塑「香港人」意識的社會化過程。可說基本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法及文獻研究法，由於香港的大眾文化在七十年代末期有個很大的轉折，真正開始發展出自己的風格和特色是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這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構成了現今香港人的集體記

憶，也是香港人現今論及文化認同的重要基點，因此在本研究中會側重香港大眾文化的歷史發展，以及在此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集體意識。本研究並未針對某一特定的大眾媒體作內容分析，一方面是時間及研究規模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因為本研究所關心的並非大眾文化的內容本身，而是著重在其在香港社會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香港人意識的影響，因此在討論大眾文化本身是以各種論及香港大眾文化的各類文獻為材料，由香港人自身對於香港文化的論述出發來討論，筆者相信，這樣的研究方法雖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對於研究香港人的文化意識應該是十分合適的。

二、香港文化的發展與香港人意識產生之歷史背景

現時的香港無疑已經產生了所謂的香港人意識，意即經常以香港人做為一種身份上認同意識的表白，這種認同意識是一種對我群的隸屬感，而認同對象範疇是以居住或者成長於香港的人群為對象。這種香港人認同意識現今是十分明顯而清楚，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中，「我們香港人」或者「你們香港人」都是很普遍的用語，顯示香港人意識不但是香港人本身的自我認同，也得到其他社會的認同，對於認同意識而言，自我認同和其他社會的認同都很重要，認同意識通常在自我認同及其他社會的認可一致時而得到強化而確認。對於現今的香港人來說，香港人意識是重要的，在生活的各個領域中不時地被強調。

獨立於中國而自足自存的「香港」意識及身份認同是七十年代以後的事。也因此香港人意識誕生於七十年代中期。開始自覺自己是香港人，本土文化也迅速茁壯成長。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是一個由「難民」與「僑居者」組成的結構，且是一「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因此港人沒有太強烈的歸屬感，加上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所以香港人得身份是模糊的、零碎的、和不穩定的。然而隨著香港社會與經濟的逐步發展與穩定，孕育了新一代土生土長的年青人，因此，所謂「香港人」的身份歸屬，實在是由「殖民化」以至「本地化」的過程，從「難民」、「僑民」到「香港人」都標誌著一段身份轉化、蛻變、成長的歷史。

如果我們回溯歷史，便可以發現在這以前，香港華人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一直與中國內地保持密切關係，與廣東珠江三角洲區域的文化生活更為一致。但四十年代國共內戰、日本侵華，大量難民南下，香港人口從六十萬激增到二百多萬；到韓戰爆發，國際對中國禁運，香港被逼從轉口港演化成工商業城市；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促成本地六七年暴動，激發大學生愛國關心社會的熱情，間接促成七十年代學生運動，而七十年代香港學運是新一代擺脫中國主流文化和身份認同的一個里程碑。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出現於學運的種種思潮與情感，與香港在中國近代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轉折所扮演的角色有密切關係。

香港自從一八四二年割讓給英國後，在英國政府有效率地管理下，成為一個繁盛的商業城市，且建立了完善的文官制度及法律制度。也因而使得她成為十九世紀末中國革命的前線，同時也提供了以西方理性制度為基礎的改革前景。但二十世紀初，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面向的意識被一種激烈的反帝反殖民的情緒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承受著「奴化」和「殖民」的指控。根據蔡寶瓊的研究，作為廣東地區文化薈萃之地，香港在以北方為中心的白話文運動中，相對顯得十分落後。故此在這期間，也被視為蠻荒的「文化沙漠」。「文化沙漠」的指控，除了反帝反殖的情緒外，也源於北方人的地域主義與傳統中國的文化大一統主義。不過此時香港與中國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文化帶，依然保持一貫的緊密聯繫。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政權的成立，與五零年代全球東西陣營的冷戰，使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起了變化。韓戰使香港與中國的轉口貿易中斷；西方國家在香港進行大量反共宣傳，和港英政府加強支持民主的宣傳；都使香港與大陸在政經方面的隔閡加大。且大批恐共的政治難民湧入，更使社會瀰漫一股政治冷漠及懼共的氣氛。在五零年代初期，香港與大陸之間仍然維持一定程度的政治及文化關係，但到了末期，隨著中國國內社會主義改革的激化，關係也漸薄弱。而共產政權的成立，對珠江三角洲文化的破壞，使得中港兩地文化面產生割裂。在文化割裂初期，香港本土意識不但沒有產生，而且在華人社會中還有一種強烈的文化自卑感。覺得自己香港文化是「奴化」是「文化沙漠」。

但不能忽視的是，香港社會此時的文化發展。戰後出生的一代成長於一個與中國大陸疏遠的環境中，接受英式教育（從一九五零年代英文中學的數目迅速超越中文學校的數目）和英美的流行文化（包括荷里活電影、披頭四歌曲、或鈔襲英美模式）。但新生代慣於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傳統的廣東城市休閒文化仍殘存於香港角落。粵劇粵曲及粵語影片依然有一定的市場。在此時整個社會的文化認同是充滿矛盾的，乃因新生代在受到父母輩的中華民族論述的影響，在接觸西方流行文化同時，又對那遙遠陌生的中國產生文化認同。而在政治冷感和恐共的社會氣氛下，他們對共黨政權下的中國大陸是一無所知，因此這代人所認同的不是當前的中國，而是一個遙遠的中華文化傳統，一個以五四為下限的現代中國。就在這脆弱的文化認同下，構成了一個潛伏的認同危機。也因而促成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

有關學運的發展情況與對香港社會的影響，已有不少香港學者為文討論，故在此筆者不欲詳加介紹。而只針對學運對文化認同之影響之背景稍加著墨。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大專院校裡出現學生參與學校政策的要求活動，接下來一九六八年的「中文運動」和一九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使學運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因兩次運動的共同特點，是強調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和愛國觀念。不過這時期所標榜的

民族認同和愛國觀念是和任何政權劃清界限，認同的是作為一個民族和文化體系的中華民族。保釣運動後，隨著共黨中國與西方國家改善關係的行動，香港的學生運動也進入另一個階段，以全面認同共產中國與醜化香港，而在這全面肯定社會主義中國，使得年輕學子覺得自己的身份認同危機可以獲得解決。

運動早期的主流，是以社會主義中國為依歸的「國粹派」。對這些被稱為「國粹派」的學生來說，認為回歸祖國是解決自己身份迷失的最直接方法，而且可以通過這途徑對香港社會矛盾提出抗議。他們認為香港是醜惡的，甚至「香港人」成為背叛祖國、甘願奴化的名詞。但他們很快就面對一個重思考的少數派「社會派」的挑戰。而「社會派」與「國粹派」的爭論與派系鬥爭，導致整個學運的消沉。一九七六年以後，學生運動迅速走下坡。明顯的，「國粹派」的回歸祖國路線，對戰後在香港出生的一代是難以接受的。畢竟二十多年來與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割裂，已經使他們無法保留上一代那種較具體的民族認同。

而當學運開始消沉時，香港新生的本土文化冒升，甚至輸出海外市場。蔡寶瓊為文指出（蔡寶瓊，1990）：

「...學運的消沉以及厭惡香港情緒的淡化，正好在意識型態的層面上，給這個強勁的新生本土文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香港人』的身份意識鋪路....」

新一代的認同危機，清楚地在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中反映出來，而當學運消沉後，這個危機最後因一個別於中國的本土文化和在意識形態上「香港人」身份的產生而獲得解決。

三、當今影響香港文化認同的發展其政經、社會背景

香港的文化形態因獨特的歷史地理環境，而顯複雜的、充滿異質的，同時又是兼容並蓄、多元化的。既有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又具備「西化」思潮下外來的因子。英國政府「不干預」的文化政策和「經濟掛帥」的政策，使香港的文化、文學長期不受重視；而中國傳統文化力量，又無法在香港根深蒂固，使得在推行「西化」的過程中，不會受到阻撓。漸漸融合各因素，最後才導致本土的文化個性。

七十年代中期是香港社會逐漸步入富裕階段的年代，而經濟發展迅速起飛後，教育日漸普遍，各種傳播媒介的興起，構成龐大的溝通網。通過此溝通網，大家都自覺是香港的一份子，共同面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關心香港的未來發展，從而產生認同，產生了歸屬感。且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後，香港政府便開始積極彌補它與香港民眾的距離，進行各方面的補救工作。注重地方發展建設、鼓勵藝文活動。特別是房屋政策方面，著意培養安居樂業的本位意識。加上七十年代開始，

香港出生及長大的居民漸佔多數，他們擺脫了上一代的流亡放逐意識，漸視香港為家，有濃厚的歸屬感。換而言之，他們日常作息、各種學習經歷及生老病死的體驗，均是植根於香港的，與香港社會一同成長，製造了本土文化發展的有利條件。

其次因教育普及和經濟發展，亦產生了一個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很多市民對本身的權利和義務逐漸有更深的認識，也因而要求參與制訂政策以爭取本身的權益，也使得市民爭取權益運動和論政團體誕生。七十年代可說是社區運動的年代，在這段時期，居民為保障本身權益，爭取改善環境而組織的行動此起彼落，形成一種社會力量。隨著市民的參與社會政治事務，而使得香港對本土的認同感日益高漲。章嘉雯指出（章嘉雯，1990:120）：

「由居民所組織的反對行動，除了針對政府的政策外，也反映出一份對社區的關心：這與戰後初期的香港社會比較，顯然多一份歸屬感。至於新聞特輯的論述...以社會整體利益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這個所謂社會整體利益的準則之所以為人接受，與市民加強認同香港社會有密切關係。說得直接一點，在這兩種觀點的背後，就是現代香港的「本地意識」」

在此我們也許可說明的是，「香港人」意識之形成，除了文化認同所產生的效果外，仍有其物質基礎。政治情勢、經濟發展及其他外來因素都有其一定的影響。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民運期間，香港人熱烈投入支持民運。通常以捐款、哀悼活動、遊行抗議、捐血、到中資銀行提取存款、民主歌聲獻中華及發報譴責中國政府的暴行、參與教會祈禱活動或加入支援團體為主。有些人士便認為香港人因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便積極關心中國民主的發展。事實上，六四事件更加深香港人的自我意識和凝聚力。例根據一份針對中文大學學生對「六四事件」的觀點的調查（1989年12月），中大學生在學運期間參與支援學運的學生高達八成半，一般在問卷中測試「國家民族」的觀念有沒有因「六四事件」而改變，結果發現，「國家民族」的觀念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因「六四事件」而明顯轉變。在事件發生以前，「國家民族」的觀念在同學的心目中是很低的，而在「六四事件」期間，「國家民族」的地位明顯地提高，一些從前沒有考慮國家民族為何物的人，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且從問卷中，得知在「六四事件」之前，約有半數同學對香港前途抱有信心，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同學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但經過六四之後，約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學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且百分之七十五的同學認為「基本法」不可能維持九七年後香港的安定繁榮。至於對「一國兩制」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在六四事件之前，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同學對一國兩制採取中立態度，而亦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同學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可見在「六四」以前，同學對一國兩制已經沒有信心。「六四」之後，更有百分之十的同學對一國兩制的推行

失去信心。因此在問及有關對自己未來前途的看法時，同學們表示面對不明朗的前景之下，都覺得失去方向。百分之四十的同學希望拼命賺錢，以爭取移民的機會，企圖在香港繁榮將盡之前儘量爭取自己的利益。有些同學則表示一種無奈無助的心態。但整體而言，大部份同學認為應實際地推動香港的民主，維持目前的經濟。

除了六四事件使港人自我意識提高外，九七問題更逼使港人更認真地思考香港人的身分問題，同時更增加同舟共濟的緊密性。也因而積極地提出「港人治港」口號及發起「我愛香港運動」。

四、從文化認同看香港本土文化現象

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迅速，社會安定。隨著社會走向富裕，消費力增加，流行文化深入各階層，流行文化事業也日趨企業化。電影、電視聯手推波助瀾造成新的流文化主流。其他大眾文化如粵語流行曲、流行口袋書、連環圖都被二者所帶動。而本土文化的冒升，即反映在這些地方性的影片、電視節目、流行歌曲及小說漫方面。從香港的電影票房到唱片的銷數，我們可以看到有香港特色的大眾文化已在本地市場站穩了腳。在北美的華人區也掀起了香港電視熱潮。

九十年代香港，普及文化幾乎可等同為媒介商品文化。「文化」皆是透過媒介包裝，經市場行銷的商品。但這種普及文化是社會集體的行為及生活方式，反映社會集體的的心理、信念及意識，可針對各文化內容詳加分析。但筆者在第一部份已說明本文所關心的並非大眾文化的內容本身，而是著重在其在香港社會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對香港人意識的影響，因此只從文化認同來看普及文化的發展。

（一）電視

香港的電視劇、武俠劇的影響力可說是威震四方，東南亞及台灣的華人及至當地人對其瘋狂程度並不亞於香港觀眾及聽眾。香港電視工業已為香港賺到不少外匯。

電視是一具普遍性的大眾傳播媒介。根據調查估計香港的電視觀眾達四百多萬人，約佔總人口 80% 以上。收看中文電視台佔全港人口 92%。擁有電視的家庭達 99 以上，電視節目平均約 75% 以上為娛樂性質。在一般家庭中，電視乃一重要娛樂及消遣工具。香港電視台的收視率為全球之冠，根據一項最新的調查報告，香港人花費在電視的時間每天平均超過四個小時。各種形形色色的「電視資訊」（例書報攤及書局的電視雜誌、報紙上的電視圈演藝界生活報導或節目介紹）均可顯現電視已深入香港人的生活世界。

香港兩大電視公司 - 「香港電視」及「亞洲電視」各提供一條中文及英文線路，總共加起來有四個線路，但可供選擇的節目仍然很少。電視台為爭取觀眾提高收視率，節目之製作方針自然配合大眾口味，因此為了要吸引觀眾，娛樂性節目當然是首選之材。從目前電視台的節目分配，資訊性節目如新聞報告、旅遊節目等佔全日的播映時間不到十分之一，就可以看出電視台本身的政策也是以娛樂性為主。香港電視節目為能廣受歡迎，於是勾劃色情、暴力等「市場性」節目便不斷地推出，而且在競相製作的單向發展的節目下，觀眾口味受到牽制，甚至在思想上、行為上、言談上都受到影響。廣告商由廣告時間之購買而控制節目之發展路線，黃金時間意味著廣告最易收預期效果的一段時間，故黃金時間之購買及爭取，就成為廣告雙方所重視的問題。黃金時間之爭購，必然會造成廣告過渡集中，而且為適應法例上的要求，電視的放映時間更一再延長。目前香港兩家電視台每週總放映時間竟超過五百小時之紀錄。電視不停地放映因而改變了觀眾的生活習慣。

回顧香港電視業發展，正好與本土流行文化同步成長。

麗的映聲於 1957 年正式啟播，且是有線的。如果市民希望能夠收看「麗的映聲」的話，便得每個月支付二十五元的節目費，才得以每天收看中午兩個小時以及晚間四、五個小時的電視節目。當時的節目極大部份都是由英國買回來的影片，而且全部是英語對白，沒有配音，也沒有字幕，其中只有新聞和氣象報導才用粵語播映。後來節目才漸漸多元化。香港電視台也隨後於 1967 年以無線傳播緊緊跟上，並在聲勢上或實質上大大壓倒「麗的」。此舉因而促使「麗的」於 1973 改為無線並以採色播映。其後英文台亦於 1974 年 4 月以彩色啟播。1975 年 9 月「佳藝電視」成立，也加進競爭的行列。但在 1978 年便倒台。兩台競爭中，1982 年「麗的」改名為「亞洲電視」，成為香港電視史的另外一個新階段。

六七到七四年電視仍屬成長期，香港城市獨特特色尚未建立，電視黃金時段仍大量播放外國舶來品。大抵電視在七四年後才正式本土化。七四到八〇年，電視全面普及化，並建立幾香港電視特色。電視「創造」大眾文化，統一市民的口味。尤其七六年電視長篇劇〈狂潮〉到七七年的〈家變〉更進一步發揮席卷香港電視狂潮。電視工業衝擊整個香港人生活，成為港人日常生活的話題。成為電台、音樂媒介、八卦雜誌、電影等媒介的中心。

從各種人口統計資料中可瞭解，七十年代年輕一輩的消費者都已長成，加上教育的普及、消費力強，本地意識濃厚，所需要的正是具有本地色彩的文化商品。電視本土化成必然的趨勢。新一輩電視製作人材亦生長於香港，亦掌握港人的口味，於是開創出本地風格的電視節目。七六年到八〇年的電視長篇劇擅於創造明

星魅力、經典場面以及大眾共同生活感性。換言之，其濃縮時代脈絡，主動補捉社會變遷的面貌。因而使得電視成為當時大眾文化的核心，掌握香港人的生活。

香港電視文化研究者周華山提出（周華山，1990）：

「七四、五年起，電視以成為普及文化權力中心，傲視群雄，其他娛樂媒介淪為從屬中心的邊緣。電視亦促成本土文化之興起....電視成為粵語天下，連普及文化亦正式本地化....，至於本地中文流行曲的興起，更完全拜電視所賜」

只是踏進八十年代，電視魅力衰落，不再成為普及文化權力中心。其他媒介紛紛獨立於電視而多元發展。

（二）電影

觀看電影在今天的香港人來說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遣。根據統計，在1988年便有超過六千五百萬人次觀看電影，即平均每一個香港市民觀看十套影片左右。這個數字是日本的九倍。這意味電影對香港人的影響力異常巨大。香港人日常生活的流行口頭禪，不是來自電視便是來自電影。除了生活語言外，電影對香港人的思想方式、價值觀、行為舉止....，均有莫大的影響力。欲了解香港人和香港文化，一定得對香港電影研究一番。筆者便常聽不少香港人提起，要瞭解香港人的性格就看港片。港片的快節奏、強烈的視覺刺激，正符合香港社會的步伐和香港人的日常生活節奏。自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本地製作的新一代粵語片統一了觀眾的口味。

在香港文化發展的過程裡，香港電影文化的本位意識最遲完成，是跟在文學、電視及流行曲之後，但它受注意的程度最大。也是它使香港文化的本位意識更明顯為人所知。香港的新電影發展相當複雜，其間不但有方言電影的問題，更涉及到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成為中國電影文化的支流之後，如何建立本土文的問題。

七十年代港片的主要成就，仍然在於把中國傳統式樣進行革新的發揚。當時大盛的「中國功夫」片便是代表性例子。很流行的「楚原 - 古龍」武俠片則屬新派古裝武俠。隨著本土文化的抬頭及城市物質高速發展，國語古裝武俠片及李小龍民族功夫片已不合時宜，因此七十年代末興起功夫喜劇。例〈蛇形刁手〉、〈醉拳〉及〈老虎田雞〉等。而許冠文一系列的城市喜劇更是宣告本土港產片的誕生。其作品包括〈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癡〉、〈半斤八兩〉、〈摩登保鏢〉及〈鐵板燒〉等等。許冠文電影走小市民社會諷刺通俗路線，以嬉笑怒罵方式對人生百態及社會問題作冷嘲熱諷。七九年大批電視編導轉投電影圈，帶動電影界新浪潮。

五、六十年代粵語片懷著沉重的民族包袱，及濃厚中國本位意識。至七十年代初的李翰祥與胡金銓，中國美藝傳統已成強弩之末，及至末年，洪金寶與成龍電影所流露的民間情趣，已是香港味道了。戰後出生的年輕導演如徐克、譚家明及許鞍華等，自幼接受香港式教育，與上一代導演有不同的記憶與生活經驗，因而看問題的角度也多從香港本位出發，與傳統中國文化的關係較為疏遠。新電影便從這個獨立於中國文化以外的文化形態中生長出來。作品也因處處流露強烈本地感性，而獲得新生代觀眾的共鳴與親切感。例〈第一類型危險〉、〈夜車〉均探討新一代青少年的失落與瘋狂；〈點指兵兵〉與〈邊緣人〉均以警匪形式反思人性與生命的正邪二元性，進而暗喻香港左右為難的政治處境；〈烈火青春〉則剖視年輕人的性愛觀。但這新浪潮在整個商業市場的競爭下，只是曇花一現。

八十年代港片大變，就是幾乎全面地隨著新時代發展而傾力走向現代化，中國傳統鄉土背景被西化新都市背景壓倒性取代。麥嘉、石天等人的新藝城公司首先由民初爛衫戲改為摩登漂亮的〈追女仔〉（台灣改為：〈泡妞〉）和〈最佳拍檔〉片集，成為八十年代中期最成功的製片公司。香港影評者石琪指出：

「...傳統中國內地題材的電影變成冷門，多的是前往拍外景的時髦大作。更重要是歸屬於香港本位的意識，在影壇完全一律...影片全屬香港派」

七、八十年代香港電影主流，一直是弄笑英雄與動作英雄為主。影片的成功，除了燦爛的動作及激烈的煽情外，最主要的是觀眾完全認同那備受屈辱的「英雄」，最後忍無可忍的反擊，便大快人心。適當地滿足港人渴求英雄及強烈發洩的集體心理需要。例〈英雄本色〉，除了槍戰刺激外，也因為故事充滿激情、悲情和溫情，通過英雄被出賣而落難的大挫敗，然後憑著義氣朋友和至親兄弟的協助，而復仇成功。此片把成就感和危機感扭結著爆發出來，非常投合當時港人的心情。

在文化認同方面，我們或許可從周華山對「亞燦」的社會意義之例再加以說明。早期粵語長片的「中國」，向來是受歌頌推崇的對象。男女主角必代表中國文化的一切優點美德。通常是大鄉里出城的故事，或是從農村到城市、中國到香港。劇中總是提醒觀眾，香港是資本主義腐敗功利的暫居之地，中國才是真正的家。五、六十年代粵語片雖在香港拍攝，並取材自香港生活，但其目光卻在於祖國大陸。大陸來客雖物質匱乏，但道德美善、忠仁孝義，代表傳統社會一切美善素質。可是，大陸來客的社會意義，到了七十年代與原先的含意大為不同。

香港戰後經濟蓬勃發展，到七十年代已晉身為國際都會城市，「香港」地位不斷冒升，「香港人」的身份自覺與認同逐漸壯大。至於戰後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又缺乏對中國鄉土的記憶，加上文革的悲痛教訓，對中共缺乏信心。再經

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一段，香港「繁榮安定」成為神聖不可犯的共識。加上隨著本地意識的抬頭，「大陸來客」與「香港人」的社會意義相互對倒。七九年〈網中人〉創造了「亞燦」形象。從此所有關於大陸來客的角色，幾乎均以「亞燦」形象出現。所謂「亞燦」成為「他者」，代表愚昧無知、少見多怪、不夠文明。相對而言，「香港人」代表進步、聰明、現代。八十年代，政治上的絕望與失落叫香港人尤其需要消費亞燦形象以發洩對中國的不滿。從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自己人」到七十年代的「亞燦」、「大圈仔」以至八十年代的「表叔」，一直到六四後的「慈祥鵬」，大陸來客不再是自己人，而是變為壓逼、侵略破壞社會秩序的「異類」。隨著九七問題白熱化，港產片進一步把「中國」建構為摧毀香港繁榮安定的「侵略者」。

（三）粵語流行歌曲

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廣受老老少少的喜愛。換言之，只要是香港人，幾乎不受年齡而均受流行歌曲的影響。它在香港市民日常生活中，看來是無所不在的。現連香港政府想要推行某種政策，均會借助粵語流行歌曲的形式來傳達訊息。粵語流行歌曲也透過各種渠道，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尤其東南亞地帶。但無論如何，它是香港社會一重要文化商品。也就是說，粵語流行歌曲的生產，每一個環節都是配合著濃厚的經濟條件。它的商品性質也使得它必須討好消費者的聽覺與口味，容易聽容易唱。但從整體上看，粵語流行歌曲無論歌詞的題材與文采，都比早期國語流行曲的多采多姿得多。

根據黃志華（黃志華，1990）對粵語流行歌曲發展過程的劃分，可分為下列不同時期的歷史發展：

（一）潛伏期（1949-1970），此時期前十年是以繼承解放前上海十里洋場的國語時代曲傳統和廣東粵劇粵曲為主。後十年，一方面是電台廣播“天空小說”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年青人的次文化的出現。這時歐美搖滾音樂和民歌統領著香港樂壇。當然此時仍有一些粵語流行歌曲的偶然騰起，只是各方面條件尚未成熟。

（二）過渡期（1970-1973），六十年代末期，台灣的國語流行曲侵入香港樂壇。但同時麗莎、鄭錦昌等專唱粵語歌曲的星馬歌手，漸引起歌迷的注意。

（三）邁向主流時期（1973-1975），這時期的粵語流行歌曲，除了是廣東小調或舊文學鴛鴦蝴蝶式的“新瓶舊酒”外，本質亦開始漸漸蛻變。有些新一輩填詞人探求新的風貌。

（四）奠基於樂壇時期（1975-1979），隨著電視劇主題曲的威力，像〈前程錦

繡>、<狂潮>、<家變>、<小李飛刀>等歌曲，都深受港人的歡迎。也因而此時粵語流行歌曲成為香港本地音樂文化的主流。使得本來唱英文歌或國語歌的歌手，都不得不順應潮流，改唱廣東歌。在電台方面，也開始全力推動粵語流行曲這種真正屬於香港本地的音樂文化。1979年，香港電台推出第一屆“十大中文金曲”選舉，顯現粵語流行曲成為香港娛樂企業的一個重要部份。這時期粵語流行曲的題材不斷更新，除了情歌之外，各式各樣的哲理歌蔚然成風，讓人們對歌詞裏所反映的社會、世途和人生如感同身受。

（五）台灣校園民歌吹襲期（1980-1982），踏進八十年代娛樂方式更多元化，且粵語流行曲經過五六年的發展，亦達高峰，因而有回落現象（當然仍有新填詞人與新青春派歌手的崛起）。而此時恰逢台灣校園民歌風的吹襲，唱片公司正好藉民歌風氣發掘新歌手，以度過粵語歌手青黃不接的時期。

（六）歌星包裝的年代（1983-1986），一些新超級歌星著重於整套包裝，包裝方法變化多端。因此歌詞便成附從的地位。例當時粵語流行曲的歌詞是經常中英夾雜，南腔北調的。

（七）樂隊組合領風騷時期（1986-1989），此時期新崛起的流行樂隊組合，而這股潮流挽救了一度陷入低潮的香港唱片市場。且同時唱片出版與新人冒起的數量激增、流行歌星演唱會興盛、六四風波使歌手唱出有關的歌曲、卡拉OK與無厘頭歌的流行。

為何在七十年代中期粵語流行歌曲興盛起來？五〇年代年青的一代，生活方式僅是沿續上一代，根本不可能有“香港本地音樂”的觀念。五六〇年代的香港，各地湧來的難民仍盼望能回歸祖國，中國傳統文化才是其認同的對象。粵劇粵曲自然成民間的主流文化。但六十年代歐美流行音樂的傳入，亦大量地衝擊當時的新年青輩六四年披頭四訪港，帶來反傳統、浪漫、個人主義的嬉皮式文化。這新的一代在香港成長，深受東西文化交流之衝擊，加上對中國內地的陌生與缺乏認同感，漸在意識形態上是以香港為中心。也因此七十年代時，適應社會需要的粵語流行曲便應運而生。再配合當時科技革新和大眾媒介的推動，使得粵語流行曲成為香港主位文化電視電台積極帶動中文流行曲潮流。尤其長篇電視劇直接創造粵語流行曲熱潮，電視主題曲統一當地樂壇品味（八三年才告式微）。周華山指出，內容上電視劇主題曲大抵是悲劇英雄+名利競逐+感情煩惱+宿命觀。電視劇主題曲所流露的英雄力保家園、俠客爭奪天下第一劍、硬漢為父報仇、白手興家等，正好是「個人英雄」年代。充份反應當時港人集體慾望與恐懼。

經過二十多年，香港終於孕育自身獨特感性的中文歌曲。一直到現在中文流行曲之受歡迎的程度依舊。例今年五月中旬溫拿五虎的演唱會，唱英文歌曲雖亦受聽

眾喜愛，但唱粵語流行曲時觀眾如痴如醉之神情，證明香港市民對粵語流行曲之熱愛程度。且從時下不少流行音樂刊物之誕生及報紙之對流行樂曲的評論的不間斷中，可看出粵語流行曲之興盛。香港胡菊人就曾在專欄〈三山人語〉中對粵語流行曲發表意見（黃志華，1990：112-113）：

「...從它在香港之盛行，可以連唱數十場，場場滿座，以及到處飄揚這些新興的歌聲，有些歌還流行於台灣、大陸、東南亞等“非粵語地區”，以及在歐美等地唐人街錄音帶之暢銷，似乎是個“主文化”....」

流行音樂雖是商業商品，卻是忠實地反映香港社會的發展。近二十年來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市民平均收入普遍提升，工作壓力卻隨著社會經濟運作的高速發展而日增；加上“九七問題”使港人情緒不安，便藉著卡拉OK唱粵語歌曲，聽“Walkman”欣賞粵語歌曲以消解精神壓力。且粵語流行曲容易上口，年青人用自己日常語言唱歌，是最自然的事了。因此，從粵語流行曲的發展來看，它已成為香港文化中重要的部份，與整個文化體系不能分割。

（四）連環圖

近年連環圖在香港大行其道，從大街小巷書報攤上琳瑯滿目的連環圖書，便可知其廣受歡迎。香港年輕人每年花在購買連環圖的金錢，數以億計，不論是打鬥漫畫或是色情漫畫，各有各的讀者。從年輕的學生到中年的上班族均有。這種連環書內容大都以誇張暴力、色情為主。原則上以香港本地的武俠形式和近來由日本傳入的色情內容為主。市面上最受歡迎的是「中華英雄」刀劍笑」、「天下畫集」等。

一般來說，五〇年代香港的連環圖大多是外來的，主要是從上海運來的。此時連環圖故事內容大多改編中國著名長篇小說，如「西遊記」、「水滸傳」等。到了六十年代開始有本地作品出現，著名作者如許冠文和上官玉郎，作品如「財叔」、「飛女正傳」等。在格式上，「財叔」模倣日本漫畫，採用了一頁多畫，使內容更連接，畫面之間更具電影感。此形式奠定了今日連環圖之基礎。但在五、六〇年代連環圖主要的讀者大都侷限於小孩子。到了七〇年代初期，香港的連環圖受三種因素影響，而產生出具地區特色的作品。一是大量翻版日本漫畫進入香港市場，使得本地創作受日本漫畫的影響，如黃玉郎等。二是受當時武打電影的影響，使得連環圖的故事取材及表達方式有些改變。黃玉郎的「龍虎門」，甚至上官小寶更以「李小龍」為其作品名稱，及他們著重武打場面的描寫，可看出武打熱潮對連環圖的影響。三是當時香港社會治安情況不好，黑社會幫派之活動相當猖獗，黃玉郎及上官小寶的作品，多是描繪黑社會活動和一批正義人士與之鬥爭之過程，大多描繪武打場面。此時期的讀者已不限於兒童，增加一些中下階層人士。

到了八〇年代，在武打連環圖界有了新的突破。首先以馬榮成的「中華英雄」突破缺口，隨後有馮志明的「刀劍笑」及馬榮成離開玉郎機構後的「天下畫集」為其中代表。此時故事編排方面，雖仍是以武打為主，但故事加進了愛情、親情、人情描寫等因素，使故事情節豐富之餘，更擺脫了以往故事的單軌武打形式。因此此階段的讀者階層也擴大，知識水平較高的人仕也加入，如大學生和專業人仕。根據一些調查顯示，目前讀者群的擴大，乃因以下原因：（一）新派連環圖的轉變，例畫功更精細，情節更豐富和多樣化及對人物有更深刻的描寫（二）香港社會發展迅速，生活步伐亦相應加快，人們面對的壓力大。於是有些人便藉看連環圖娛樂一下，舒緩壓力。且看一本連環圖只需二十分鐘，在任何場所均可拿出來看（三）香港經濟蓬勃，一般家庭的收入亦顯著增加，消費能力亦提高，能有更多金錢花在休閒娛樂上。

綜觀連環圖，我們發現它除了是一種休閒讀物外，亦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社會的現況，社會上普遍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從連環圖發展的歷史來看，可發現連環圖與電視、電影等其他普及文化掛鉤，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密切關係。

（五）粵語口袋書

八十年代香港掀起中文口袋書熱潮。這種輕薄短小、內容淺白易懂的通俗讀物，特別迎合當代城市人的生活節奏和閱讀習慣。根據香港大學陸鏡光的研究（陸鏡光，1991），指出在這樣一片口袋書熱潮中，冒起了一種獨特的文類，文字幾乎全以香港地道口語為基礎，打破了以往一切以文言和白話為依歸的慣例，誦讀起來，直與日常口語無異。事實上，在一般報章雜誌早就有口語化的文章，可是八十年代興起的粵語口袋書，不但把這種形式再往前進，在成書數量、讀者層面、以至社會影響，都遠遠超過了先前的小文章，甚至可以說成就了一種讀、寫此種文類的氣候。

因此粵語口袋書可說是一種社會語言現象，有其社會文化意義。隨手翻開一本粵語口袋書，可能發現滿口方言、中英夾雜、隨機即興，但其書寫手段之運用仍有其系統和步驟。陸鏡光指出粵語口袋書書寫系統之特色是：

「....(1) 它擴大豐富了書寫手段；(2) 改變了兩條原則之間之相互關係，過去是以漢文原則為主，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放棄音近原則....(3) 加強了音近原則，強調重現口語，辨識音值，交通意義之重要性」

這種口語化的文字現象，說明香港文化發展的獨特特色，與加強香港人之意識。

（六）本地語言與文化現象

本土意識的冒升，同時意味著一個強勢的本土文化和語言的興起。故筆者在此將略談目前香港的語言現象。

1. 口語化

一種語言的發展，決定於那地方的人口結構、經濟情況和政治環境。三十年代的香港是由少數外國人和大多數操不同方言的中國人組成。為有共同語言，普通話便成為溝通他們之間的橋樑。當時 ZEK 把英文新聞翻譯成粵語和普通話，可見當時國語的地位甚高。四十年代末，中國政局動盪，大批上海資金流入香港，擁有這些資金的人不與本地文化認同，以普通話為溝通語言。由於他們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連帶地也把普通話的地位也相應提高。當時香港有不少學生都打算回中國內地升學，因此普通話教學是很普遍的。且在與中國進行貿易往來過程，亦間接提高普通話的普遍性。直到 1950 年的禁運，把香港和中國分割出來，香港開始發展自己的工業，新一代開始孕育自己的文化。前期移民也漸落地生根。因而有利普通話發展的條件不復存在。五十年到七十年代後期，期間雖有人大力提倡“中文運動”“保釣運動”等有利普通話發展的運動，但始終沒有多大的作用。香港便一直以粵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當然踏入八十年代，因政治經濟所需，香港出現學普通話的熱潮，普通話的地位也日益提高）。

從七十年代開始，幾種文化形式的改變，標誌著本地語言的成熟及抬頭。這包括前面所提的粵語歌曲、電視劇集及粵語電影的蓬勃發展。也就是說，本地語言的抬頭，與文化形式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蔡寶瓊指出（蔡寶瓊，1987）：

「...以本地話為媒介的文化形式已受到普遍歡迎...以前語言是有階級性的，英文及中文分別為統治階層接壤者及中國知識份子的標誌，而廣東話則為販夫走卒的俚語。到了現在，這些階級標誌已逐漸失去其重要性。在戰後成長的一代中，英文及書寫的中文再也不是明顯的身份象徵。相反地，一套階級及新舊兩代的語言已產生了 - 那就是本地化的廣東話」

目前香港文藝界亦有以這種「口語化」的語調，從事創作，尋求塑造香港本土文化的內容與形式。而這種「香港話」及香港產生的各種文化及生活形式，已輸出到沿海的中國城市、廣州鄰近的地方，以及東南亞等國家。也因而目前所提倡的「母語教學」，得考慮這新興的「香港話」如何配合教學。

近來香港衍生了這中英夾雜、不文不白的口語化英式中文，乃是順應環境及日常生活形態而來的。今天的香港本來就是在日常服裝、消費品味、行為舉止及道德

觀念等生活取向，自然流露出一種不中不西的獨特感性。且香港社會自然孕育出新的語言，例如「屈」、「威」、「架」、「羅」、「where 銀」以至「你講野呀！」等，都無法以其他語言系統所取代和翻譯的觀念。這種地道的粵語正好證明了香港這個華洋夾雜城市的獨特文化。

2. 「無厘頭」文化

踏進九十年代瘋狂弄笑、雜亂無章的「玩野」模式，已成為視聽媒介主流，俗稱「無厘頭」文化。首先有震撼本地潮流文化的「軟硬天師」，胡言亂語、不按牌出牌的「語言笑料」成為主流。一般來說，「無厘頭」大都流行於青少年群中，由於青少年反傳統及喜歡創新，批評固有的社會規範，因此此種特質容易與無厘頭的特性吻合。而這種無厘頭便成為他們談話間的主要內容與方式。且香港僵化的教育制度，使得一些年輕人藉著說一些反邏輯、荒謬的話來紓解內心的壓力與抑鬱。因此無厘頭說話方式、電影與電視節目正好做為他們逃避現實和發洩悶氣的最佳途徑。

其實，無厘頭文化乃是企業透過媒體所製造出來的潮流文化或商品文化，電影、電視、雜誌及袋口書紛紛地呈現各種誇張、卡通化的角色。加上九七的到來，政治局勢的不明朗，使得不少人藉著無厘頭的說話方式以逃避對現實的不定感。不管無厘頭文化是否帶來不良影響，但它呈現香港另一種影像文化及語言現象。

五、綜論

(一) 結語

認同是主觀的社會氣氛，是一種集體意識的表徵，並不是單一的因素所能左右，而是一個社會在不同的歷史過程逐漸發展出來。現時的香港人意識的形成和大眾文化的發展同步成長，形成一種以香港本地廣東話為主要媒介的本地趣味文化。香港人的意識認同在大眾文化中形成，意即認同這種本地文化是可以代表香港文化或者是以為此為香港文化的主流，這種感覺是主觀的感受，不可以理性方式來推斷其功過，或者以其他社會的模式標準來衡量。認同流行文化、媒體文化、大眾文化、廣東話的興味，已經是香港人意識認同的最主要來源，如同在台灣發展出來以鄉土文化為認同對象的社會氣氛一樣，形成文化意識的主流，並且席捲社會的不同層面。

我們可以從香港大眾文化發展的歷史，以及香港人在不同公共領域所發表的各類關於香港人、香港文化的整體論述中，清楚的看出香港大眾文化與香港人意識形成的密切關係。香港人意識在大眾文化的發展中形成，而香港的大眾文化在香港

人意識的推動下進一步發展出港式風格和本地口味，其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現在要理解香港人，就必須理解香港人的認同意識，要理解香港人的認同意識，則必須對香港的大眾文化中所形成的一些精神氣質有所認識。

七十年代起，香港居民已逐漸擺脫過客心態，建立了對香港社會的認同與歸屬感。電影上的本地意識最早見於許冠文七四年〈鬼馬雙星〉；流行音樂上的本地意識可上溯許冠傑七四年的歌曲；電視的本地意識興起的時期也相若。「小男人周記」、「軟硬天使」、「馬路天使」式口語化廣東語大行其道。中英夾雜、非文不白的口語化廣東話成為暢銷書面語。隨著七、八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不斷開放及國際化，港式中華民族情懷益更薄弱與抽象。及至七九年，香港不單認同香港，熱愛香港，並「香港幾好都有」、「香港世界第一」等自豪的言詞充斥媒介與日常生活。這種對香港本土社會文化的身份認同迅速膨脹為「大香港意識」。周華山指出（周華山，1990:127-8）：

「...港式民族情懷其實只是一種很抽象的”中國心”。香港人沒有自己的國家，沒有認同的中”國”。我們不喜歡亦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政權，對國民黨以至中華民國感到陌生與疏離，對英國人亦無好感。我們只有一份很抽象的民族認同 - 沒法落實於任何國家。社會文化上，我們對”香港”的認同遠遠比”中國”強烈。感情上我們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也喜歡大陸的名勝風光、古蹟文物，但始終感到不屬於這個社會，更不願意生活其中...八五年五月十八日香港足球隊擊敗中國隊，奪得世界盃外圍賽小組出線權，香港全城歡欣慶祝，沒有人內咎不安 - 我們均是香港人...，到歐美國家旅遊探親，被洋人問及君從那裡來。我想，我們只會答：”我來自香港”或”我是香港人”，而不會說：”我是中國人”...」

他更指出（周華山，1990:135）：

「...九七早成死症，香港前途黯淡，政治上缺乏途徑上達民意，市民只好寄情媒介消費文化，盡情渲洩集体恐慌、不安與憤怒。政治上不可能出現”港獨”，但社會文化經濟上”港獨”已成事實..」

香港在這二十年來，在消費文化發展出自身的特色，也建立出本地化的香港文化及發展出「香港人」意識，對香港的認同遠超過中國。一種非民族性的地方文化常在普及文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論是電影、電視劇、流行曲或流行小說，都不斷為這種地方文化唱著讚歌，而掉過頭來嬉笑怒罵中原的民族文化。而這種對社會文化的認同，帶動市民積極介入關心社會的活動。可以說，「香港人」這個觀念，已有了實際的社會文化基礎。

（二）具體建議

實際上，隨著九七的迫近，中國內地也不斷地積極透過各管道形塑香港人的「中國意識」。兩地經濟發展之密切互動，實是一重要關鍵。粵港金融合作對兩地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由內地特別是廣東提供較低廉的人力、土地費用成本；較為靈活地吸收、改造和運用中等適用技術；而香港作為國際性經濟中心提供了優良的金融、電訊、港口及市場營銷等服務。對於這些優勢的形成，兩地金融業的配合和保證起了重要的作用。

而中港兩地不只政經關係密切，在文化教育界亦交流頻繁。除了透過某些親共的學校，藉著教育加強港人民族意識和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外，當地不少雜誌不斷地加強香港人的中國意識，推廣加強兩地政經合作的觀念。並介紹中國各名勝古蹟及各風俗民情之介紹。例香港一位傳播界的學者李子新在一篇文章提到：

「香港社會存在著失敗主義、焦慮和無奈感，尤其在受過教育的以及低下階層為然....香港不少人既不認同國家，亦沒有強烈地認同香港。另一方面，香港人之中百分之九十九都使用中文，說中國話，並且基本上生活於中國文化氣氛中。既然香港的主權回歸有期，港人必須學會治港愛國，培養對國家和香港的認同感....在電視上播放祖國雄偉的山川、少數民族的生活和習俗，以及富有中國特色的音樂和舞蹈等，將有助於香港人對中國的隔膜」

從一份親共「紫荊雜誌」九一年八月號中可看出加強形塑「中港一體」同舟共濟的形象。

「七月上旬以來，大陸水災災情嚴重。中國政府發出緊急呼籲後，香港各界人士立即響應，迅速掀起賑災捐款活動。各行各業齊行動，男女老少同參加，形成“民族情、同胞愛、賑水災、不容辭”的一場熱烈廣汎的行動，體現了香港同胞愛國的高尚情操」

香港各報、電台和電視台都及時報導了內地災情、國家救災措施和香港各界的賑災活動，兩家電視台、商業廣播電台和一些報紙也派出記者往災區實地採訪。「明報」社評說：

「中國有難，香港人義不容辭。香港人應該毅然決然 投殃而起，全力發動對祖國大陸的就災活動」。

香港本地也在一些有心人的精心籌劃下，經常舉辦「弘揚中華文化」的演講或研討會。香港南源永芳集團公司董事長姚美良為促進中華文化之推行，便捐資數千

萬元在中國大陸舉辦不少活動。類似這樣捐資辦活動或興學育材之例子，倒是不少。香港名譽理事長霍英東對中國內地的建設與發展相當關心。他在內地的捐贈和投資總數已近十六億港幣。他在接受一記者訪問時說：「我生活在香港，但我是個中國人」。事實上對大部份老一輩香港人而言，「中國人」意識仍相當起作用的。當然亦有不少基金會加強在香港展辦「認識中國」的藝文活動。

那在中港關係密切交流下，臺灣對香港的文化政策又該如何進行？最後也從本研究的成果對政府港澳工作提出初步建議。過去政府的港澳工作顯然花了不少心力，也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工作。但是有兩點是可以提出討論的：第一是政府的港澳工作主要在著重學術性、政治性及菁英性的文化，對於大眾文化的關注卻是明顯的不足，以致於在這個重要層面缺乏發言位置。第二是政府的港澳工作並未對香港人對香港文化的認同予以重視，以致於所舉辦活動的文化意識都是由我們自己的觀點出發，以致於難以引起一般香港人的認同與共鳴。如以中國文化協會所從事的工作為例，有國家慶典和紀念節日活動，如元旦、雙十國慶、紀念黃花崗烈士等，有中國文化研習班、中國文化講座、文藝創作獎、書畫展等，固然是很重要的文化活動，但是如果放在香港人的生活來看，卻沒有和大眾習習相關的大眾文化有關連，也沒有和香港人關心的議題相結合，自然不容易打入港人生活的核心。

因此在此建議，政府的港澳工作應該注意體察香港人對於香港文化的認同意識，並且考慮香港是一個大眾文化發達的社會，多採用可發揮大眾文化社會或是大眾媒體社會特性的方式，促進台港兩地的文化交流與溝通，以進一步增進相互之瞭解與支持。

*本文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港澳處支持並提供經費才得以完成，謹誌謝意。在香港二十多天的田野期間，感謝中華旅行社、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朋友們的提供意見與協助收集資料，在此一併誌謝。

(1) 自從“香港學”作為研究香港歷史、政治、經濟、地理、文化教育及風俗等專門學問被提出來之後，引起香港和海內外文化學術界的重視。“香港學”的突起，有助於促進香港市民關心自己的社會，和瞭解自己的社會。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ker, Hugh D. R.
1983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 The China Quarterly, 95:469-480.
- Choi, Po-King
 1990 "From Dependence to Self-sufficiency: Rise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Hong Kong," Asian Culture No14 April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pp161-177.
- Hall, S. et al (eds)
 1980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King, A. Y. C. and R. P. L. Lee (eds.)
 1981 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au Siu-Kai
 1982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Luke Kang Kwong (ed.)
 1992 Into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Issues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 Siu, Helen F.
 1993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South China."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London: Saxon House.
- 丘智傑等
 1985 香港連環圖發展史。
- 元邦建編著
 1987 香港史略。中流出版社。
- 王齊樂
 1983 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波文書局。
- 何世明
 1982 人的教育。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 呂文鴻
 1989 媒介與文化。長文書局。
- 李明琨
 1992 變遷中的香港政治和社會。商務印書館。
- 李焯桃
 1990 八十年代香港電影筆記。創建文庫。
- 周華山
 1990 周潤發現象。青文出版社。
- 周華山

- 1990 消費文化: 影像. 文字. 音樂。青文出版社。
- 周華山
1990 電視已死。青文出版社。
- 旺角街坊會陳慶社會服務中心
1990 由臣民到公民 - 民主運動與香港。
- 突破雜誌
1991 「無里頭文化」。突破 1991 年 1 月號。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1983 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廣角鏡出版社。
- 馬傑偉
1992 電視戰國時代。次文化堂出版公司。
- 張正平
1970 香港學生運動。大學生活社。
- 張志強
1980 香港電視廣告業的研究。香港珠海書院經濟研究所。
- 陸鏡光
1991 「在大義與小說之間：香港粵語口袋書的書寫系統」。「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論文。
- 章嘉雯
1990 攜改錯液赴考的一代----普及文化觀察。青文書局。
- 曾樹基
1984 香港與中國之間。廣角鏡出版社。
- 焦雄屏
1988 香港電影風貌。時報文化公司。
- 黃成榮
1991 「探討香港青少年的無里頭文化」。明報月刊 1991 年 6 月:
pp.79。
- 黃志華
1990 粵語流行曲四十年。三聯書局。
- 黃霑
1991 「流行曲與香港文化」。「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論文。
- 黃鎮忠
1985 「香港中文中學的現況與前瞻」。教育曙光, 26 期。
- 楊奇主編
1992 香港概論 (上、下)。三聯書局。
- 楊森
1988 香港民主運動。廣角鏡出版社。
- 遠東事務評論社

- 1982 學運春秋。遠東事務評論社。
- 劉定堅
- 1989 連環圖大風暴。自由人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 蔡寶瓊
- 1987 教育社會學觀察。廣角鏡出版社。
- 蔡寶瓊
- 1990 <從「奴化教育」與「文化沙漠」到本土文化的抬頭 - 香港文化的發展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轉折>。教育學報 8 卷 2 期。
- 鄭宇碩主編
- 1991 創造香港新紀元 - 「我愛香港運動」學術論文集 (上冊) 突破出版社。
- 魯言
- 1985 香港社會剖析 (3) - 賭在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盧子健
- 1991 中港關係面面觀。突破出版社。
- 羅國威
- 1988 香港連環圖業興起的成因及其影響。百姓半月刊第一七二期。
- 羅貴祥
- 1990 大眾文化與香港。青文書局。